

【文化研究】

一种儒化的道教文化

——论早期全真道基本教理教义中的儒家思想

郭中华

(湖北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早期全真教的基本教理教义中,蕴含着浓厚的儒家思想。在自我修持上,全真宗师有着德识双馨的克己追求,注重学识与德行的提升与内省;在积行累功中,有着普济众生的行为践行,展现出兼济天下的仁者情怀;在伦理参悟上,倡导忠孝人伦,主张忠孝亦是修行的修持观,体现了全真对儒家伦理纲常的深层认同与吸纳。

关键词:全真教;儒家思想;真功;真行;援儒入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4)01-0078-05

全真教是金初由王重阳(1112—1170)创立于我国北方的一个道教流派,发展迅速,元代臻于极盛。元以后其与正一教对峙而传,嗣响闻于至今。自创建以来,全真便积极接近和吸纳儒士阶层,在组织上形成了儒化的群体构成。同时全真宗师把儒家经典《孝经》定为入道者必须颂读的书目,并对儒家修身内省、克己为仁、忠恕孝悌等思想进行深层的认同与吸纳,援儒家思想之精髓入全真之教理,使得全真在教理教义上展现出鲜明的儒化色彩。

一、内修真功——德识双馨的克己追求

对全真教内修真功这一基本教理,以往学者多从“明心见性,全真而仙”的内丹学角度对其进行诠释,认为全真的“真功”修持就是指体证真我、先性后命的内丹修炼。这种阐释并无不妥,但从全真教众实际的修持理念及修持实践来看,这一阐释并不全面,其忽略了全真教“内修”的一个基本内涵——修身,也即对自身涵养富湛广博的境界追求。更具体来说,这种追求就是对自身学识、德行提升的一种自律。

全真注重学识提升的修身理念,始自教祖王重阳。《重阳立教十五论》第二论是“云游”论,其曰:“登巖峻之高山,访明师之不倦,渡喧轰之远水,问道无厌,若一句相投,便有圆光内发。”^{[1]275}此论把云游的重点置于访师问道上,与孔子“不耻下问”、“学而不厌”的治学精神一脉相承。后世之人常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宏括治学之道,而王重阳的“云游”论可谓把治学之道的一半精髓给点透了。《重阳立教十五论》的第三论是“学书”,云:“学书之道,不可寻文而乱目,当宜采意以合心,舍书探意采理,合理采趣。采得趣,则可以收之入心,久久精诚,自然心光洋溢,智神踊跃,无所不通,无所不解。”^{[1]276}学书是人们提高学识修养的一个重要方法,也是治学之道的另一半精髓,正如孔子所云“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读只是外在的行为方式,把具体知识融会、吸纳、升华,把有形的书牍变成无形的思想智慧,才是读书做学问的终极追求。

收稿日期:2013-10-27

作者简介:郭中华(1985-),男,河南周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元文学研究。

全真在创教之初虽主张不立文字,但对知识学养的追求,却始终是全真教众修身的一种自律,甚至被视作成功修道者的一个文化标签。《竹坡丛话》载:“有好事者问邱长春曰:‘神仙惜气养真,何故读书史作诗词。’曰:‘天上无不识字神仙。’”^{[1]1912}此话可当丘处机玩笑之语,但亦可从侧面反映出全真教把读书史作诗词当做内修的一种文化自觉。这一风尚为全真后人所继承,金元及后世涌现的大量全真诗词恰可很好地映证这一点。

在德行方面,对于道德品格的提升与内省,始终是儒者严于恪守并引以为豪的人格保鲜方式。正如儒家所倡导的“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省”,是一种高度自觉的自我提升与反观的修身理念。这一观念被儒者内质十足的全真教众深层接纳与吸收。在全真者看来,道德境界的高低是人格完善与否的一个折射,对品德的修持是内修真功的一个重要方面,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内丹心法的参悟。所谓“这个修行总不知,元来只是认真慈”^{[1]14}，“身贤认得真贤,便是逍遥陆地仙”^{[1]32}，“未欲修持,先通吉善,在家作福堪当。晨参夜礼,长是薰名香”^{[3]172}。把王重阳的这些言辞参之《论语·宪问》中孔子的话“君子之学,以美其身”,可以发现,二者在本质上殊途同归。全真一代宗师丘处机在《长春真人规榜》中教导门人曰:“柔弱为常,谦和为德,慈悲为本,方便为门。”^{[4]147}丘处机这一训导,揉和了儒、释、道三家思想之精华,但作为其“有为”理念的一种具体阐释,儒家思想仍为主导。他在《长春丘真人寄西州道友书》中说:“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休,乃内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4]144}。这里的“内日用”指的就是内修。于此也可以看出其克己修身、躬身自省的全真内修观。

全真这种对学识、德行自觉追求的修身理念,一直为全真后人继承和发扬。全真教众中德识双馨、谦和博雅而倍受当世及后人敬仰者,不乏其人。这使得全真教在世人尤其是儒士心目中树立了光辉鲜亮的形象,这也正是全真文化与儒家文化融汇共鸣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外修真行——普济众生的仁者思想

“真行”的修持之于全真者,表现为“修仁蕴德”观念的树立和“普济众生”行为的践行。而在实际的修持中,全真者更加偏重后者。他们把儒者那份敢于担当、兼济天下的济世情怀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把儒家核心思想——“仁”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形而下的转化,变成具体的社会事功。对“仁”的具体内涵作出了行为上的阐释。

王重阳在《玉花社疏》中引用晋阳真人的话:“若要真行者,须是修仁蕴德,济贫拔苦,见人患难,常行拯救之心。”^{[1]160}又在《三州五会化缘榜》中说:“普济众生,遍拔黎庶。银艳充盈于八极,彩霞蒸满于十方。……人人愿吐于黄芽,个个不游于黑路。”^{[1]255}此语既有杜工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5]2310}的怜民情怀又有教风远播四海一统的远大理想。

王重阳不仅仅在观念上训导门人,更在教众的行为践行上加以引导。他在《立教十五论》中提出了“和药”一论,谓医药之术“肯精学者,活人之性命;……学道之人,不可不通。若不通者,无以助道”^{[1]276}。还在其诗中说:“救人设药功尤大。”^{[1]143}全真后人遵从其旨,行医施药者颇多。如刘处玄的弟子催道演,禀赋优异、不念尘俗,洞晓仁德之大义。“假医术筑所谓积善之基,富贵者无所取,贫窶者反所多给,是以四远无夭折,人咸德之”^{[6]495}。

全真者认为修仁德和体悟真行是相通的,多施仁义之举,同样可以证真成仙。马钰说:“仁人可以同仙福。”^{[7]458}王处一:“仁义通开生死关。”^{[7]692}丘处机对“仁”深有体悟,对仁者思想的实践转化更是不遗余力,曾多次应需到各地进行斋醮活动,为民祈福。同时,他还勉励教众勤于耕耘,把余出的粮食及富人捐赠的钱粮拿出来救济饥民。全真弟子尹志平有词云:“怀仁抱义。五帝三皇因此治。抱义怀仁。天下生灵一体亲。勤参道德。建国成家为法则。道德勤参,更与修身作指南。”^{[3]1184-1185}这是孔孟仁政思想的另一叙述版本,仰崇三皇五帝、胸怀天下生灵,德识更加高远。儒家修身、起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体系与人生坐标再次被打上了崇高的印记。这已不像是一个遁迹山林、出世脱尘的道士所作,俨然是

一位心系天下、苦心用世的儒匠之词。继尹志平之后,全真另一掌教李志常亦以仁义广施天下,为时人所敬仰。翰林学士王鶚在《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中说:“若夫以清静养真,以仁恕接物,华实相副,文质兼全,名重望崇,使远近道俗趋拜堂下,惟恐其后,则吾真常公有之矣。”^{[6]578}名望之重,道俗共仰止。丘处机一西觐随从弟子潘德冲,也以仁义之怀威重一时。翰林侍讲学士单公履在《冲和真人潘公神道之碑》中说:“师(潘德冲)性资仁裕,戒履修洁,虽居道流,然乐善好施。”^{[8]762}这些全真者都能深悟仁义之真谛,怀抱推己及人、怜惜民瘼的仁者之心,张扬了全真道士兼济天下的普世精神。

全真这一“真行”理念,归根结底是对儒家“仁者”思想的深层认同与吸收,并把它转化成具体的行为实践。这在全真援儒入道的文化建设上是一个成功的举措,也映射着中国古典文化的包容性与互渗性。

三、倡导忠孝——参道伦理的别样修行

全真者虽力倡离尘脱俗,超然物外,但对儒家的忠孝人伦却保持着认同吸纳的态度,并把其置于修行的首位。全真者认为“真道”出自纲常,纲常之外别无道也。道的真谛来自现实社会。这是一种积极的修行态度,也是一种至纯的参悟境界。王重阳在《金关玉锁诀》中说:“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此修行之法。”^{[1]280}把对忠孝人伦的履行视作一种体悟与修行,对世人来说是一种至纯至善的劝导,对全真教来说,无疑拉近了其与现实社会的距离。他作词以示世人:“人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乡,频行孝,以序思量。”^{[3]172}他的弟子王处一也说:“常行忠孝无私曲,应有神明指正宗。”^{[7]651}于此可见全真宗师在履行忠孝与修道成仙之间架通了一座义理的桥梁。

现把忠孝分开而论。具体到忠君方面,教祖王重阳要求教众遵纪守法,认为“道情勿能转,王法宁肯畏”^{[1]18},倡导“会要修持遵国法”^{[1]156}。马钰认为修行之人应“谨遵依、国法天条,永不犯不犯”^{[9]115},“遵国法、莫犯天条”^{[9]123}。丘处机亦在其诗词中阐发忠君思想,他在献给金世宗的《瑶台第一层》词中说:“前王创业,太平难遇道难期。会逢天佑,遐荒入贡,玄教开迷。坐朝垂听暇,伴赤松,谈论希夷。”^{[3]479}世宗见之大为喜悦。全真后人皆能谨遵此旨,在忠君方面毫不懈怠。

在行孝上,王重阳把儒家的经典《孝经》列入道者必读书目,并要求门人“长行孝顺酬斯价”^{[1]110}。因此清代后学陈教友评王重阳曰:“重阳之学,奉老子为依归者也。而其教人则以《孝经》称首。”^{[10]51}切中肯綮。丘处机亦宣扬“人罪莫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的儒家“孝”文化,并身体力行对《孝经》勤于研诵。其虽皈依玄门,但对父母仍深怀眷恋,当他得知乡人信士将其父母改葬的消息时,心潮激荡感动不已,遂秉笔创词一首《满庭芳》来表达对乡人信士的无限感激。词序云:“余自东离海上,西入关中十五余年,舍身求道,圣贤是则。坟茔罢修,考妣骨骸,孰加怜悯?迩闻乡中信士,戮力葬之,怀抱不胜感激。无以为报,遂成小词,殷勤寄谢云。”^{[3]458}情之真切,意之深厚,深透纸背。

需要指出的是,王重阳还把孝的含义进行了展衍,使之推广到尊敬师长上,并提出了“三布施”的具体要求。自此全真宗师对门徒均有严格的要求,使其对师长敬重尽孝。在全真典籍中有不少是记述宗师传教事迹、感恩宗师点化之功的诗词,如《金莲出玉花·得遇行化》、《论恩》等,感恩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在全真文献中,可以看到很多“师父”、“父师”的称谓,这正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尊师观念的体现。大定十年(1170)王重阳于汴梁仙逝,马钰、丘处机等弟子遵其遗志,将其灵柩迁葬故里终南,并为其守丧三年,不折不扣地履行了儒家的服丧礼仪。可见全真教对世俗孝道伦理的重视。

对于为政者,全真者亦有规劝,谭处端说:“为官清政同修道,忠孝仁慈胜出家。”^{[7]849}刘处玄也说:“忠孝治民,静心养性。意不外游,自然神定。”^{[7]434}“治政清通,为官忠孝。节欲身安,他年蓬岛”^{[7]440}。对为政者进行忠孝劝化,其意指已不再拘囿于“修身成仙”的规劝层面。《论语·为政》中孔子曾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社会风尚的好坏,为政者起着向导的作用。这正是全真教众对为政者进行忠孝劝化的深意所在。

全真文化中清晰的儒家印迹，导源于“三教合一”援儒入道的先天基因。而历史证明，全真这些基本教理顺应了历史潮流，其鲜明的儒化色彩饱含着浓厚的本地气息，而正是这股独具特色的儒风，吸引着大批文人士子，使全真教成为当时文人的“隐修会”^[1]。正如任继愈先生所说：“金元之际的全真道，把出家修仙与世俗的忠孝仁义相为表里，把道教社会化，实际上是儒教的一个支派。”^{[12]6}正因如此，才造就了其复合多元的全真文化，而这一复合多元性，也正是全真道教文化的价值之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全真教如此鲜明有力地倡导“三教合一”，一是对由来已久的三教合一思想的承继和发扬，二是在战争频仍、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全真为世人提供身心双重拯救的现实所需。后者则为主要原因。

援儒入道的目的是吸纳儒家的精髓为道所用，而不是模糊儒道、不分彼此。儒家之于全真，只是外在“真行”修持上的理论借鉴，主要体现在德识与人格的提升与保鲜上。而在内在“真功”修持上，在最为核心的修行心法——内丹修炼上，全真则十分注重门户的自重与师传。对本家修行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自信心与优越感。全真两位掌教马钰和丘处机曾有诗词对此进行论说，颇有意蕴。马钰有诗云：“身在儒门三十年，不知一字大如天。偶因悟彻风仙理，顿觉灵明满大千。”^{[13]249}丘处机在其诗《访终南怀道村宁之道留宿竹园》中云：“怀道访之道，摅情远世情。安居神自爽，欲睡梦还惊。仙院风光雅，琼林月色清。儒生真得趣，奚恋紫袍荣。”^{[4]51}又在其词《西江月》中说：“莫把修丹看易，无师坐破蒲团。药材火候少真传。忘泄天机受谴。世上黄缙千万，试看那个成仙。只因执著坐空禅。强把身心静敛。”^{[4]157}此中意指十分明了。

这一思想在全真后人中尤为突显。略举全真后人于道显的几首诗作，从中便可窥见其意指。

示龙窝张会首

吾家门户几人知，知者须明造化机。
清静之中含妙用，无为之内隐玄机。^{[4]41}

示道人

众妙之门日日新，家风冷淡绝纤尘。
闲招云外长生客，同赏壶中不谢春。^{[4]43}

示费庄夏会首

我家门户本幽玄，寂寂寥寥任自然。
修短纤洪都莫话，饥来吃饭倦时眠。^{[4]46}

全真道士对本家修持保持高度的热衷和持重并无可厚非，全真之所以为全真自有其独特的文化核心与独树一帜的修行法门，全真道士有足够的理由维护其自信心和优越感。但全真门风又从未显现出“唯我独尊”排除异己的门户之见，反而对儒释取长补短、借鉴融合，摒除外在的分歧，存异求同，以求和合圆融。这恰也说明了全真文化的博融与独特，博采众家又不失本色。

参考文献：

- [1]王重阳.王重阳集[M].白如祥,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 [2]唐圭璋.词话丛编: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 [3]唐圭璋.全金元词[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4]丘处机.丘处机集[M].赵卫东,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 [5]全唐诗:第七册[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6]陈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 [7]道藏:第25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8]道藏:第19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 [9]马钰.马钰集[M].赵卫东,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 [10]藏外道书:第31册[M].成都:巴蜀书社,1994.
[11]陈 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62:2.
[12]任继愈.中国道教史(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13]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第一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14]薛瑞兆,郭明志.全金诗:第三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The Taoism With the Character of Confucianization

—The Confucianism in Early Basic Doctrine of Quanzhen Taoism

Guo Zhonghua

(Faculty of Art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There is strong Confucianism in the in Early Basic Doctrine of Quanzhen Taoism. In self-cultivation, the masters of Quanzhen Taoism have the pursuit of getting harmony between being excellent in ability and moral conduct as well as being strict with themselves. 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wisdom learning and self-examination. In virtue accumulation, they offer blessings and wish merit for every living being, showing benevolent feelings of caring about the whole society. In moral comprehension, the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loyalty and piety ethics. They think loyalty and piety ethics are the principles for self-cultivation, which reflects that Quanzhen Taoism has deeply approval and absorption of ethic codes in Confucianism.

Key words: Quanzhen Taoism; the Confucianism; Zhengong; Zhenxing; complementing Taoism with Confucianism

(责任编辑 崔福林)

(上接第23页)

- [8]2006年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
[9]范 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10]魏道明.始于兵而终于礼——中国古代族刑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1]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2]基 佐.欧洲文明史[M].程洪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Examination of the Crime of Offending Imperial Power in Han Dynasty

Feng Hong

(Politics and Law Department,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35, China)

Abstract: The crime of offending imperial power is one type of criminal getting the most heavily punishment in successive dynasties criminal law, which includes harming the body of emperor, subverting the government and destroying the ruling order. While, the crime associated with offending imperial power in Han Dynasty included not only heretical behavior, deceiving the emperor, slander, sensational speeches, cunning, but also committing regicide, losing the courtier ceremony, misleading people and dereliction of duty were included and all the above crimes were be punished heavily. In addition to putting down the rebellion, imposing heavy penalties of offending imperial power was also the political tool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those who hold different views within the ruling class.

Key words: Han Dynasty; criminal law; imperial power; the crime of offending imperial power; worst offence

(责任编辑 张春生)